

相關學術會議報導

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由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合辦，為促進民間團體與研究機構學術交流，並鼓勵民間學人從事台灣史研究風氣的研討會——「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業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假中研院三民所會議室舉行。會中除發表論文九篇（其中六篇屬專題研究論文，三篇為資料發掘報告），並舉行「台灣史料之發掘與運用座談會」，由省文獻會副主任委員劉寧顏以「地方文獻資料蒐集及整理情況報告」為引言，展開討論。與會人員，包括從事台灣史研究學者，民間學人及地方政府專責文獻整理工作人員。

茲錄所發表論文之作者、篇名，並簡介其內容如後：

湯照勇 清代巡台御史夏之芳的事蹟

清康熙六十一（一七二二）年朱一貴事件平定之後，清廷始派「滿漢監察御史巡察台灣」（簡稱巡台御史）。巡台御史的任期，初定一年一更替，但因初設之時，適逢聖祖崩逝，首任巡台御史吳達禮與黃叔瓚，以政局安定為考慮，予以留任一年。其後，巡台御史的任期長短不一，但以留任一年為普遍。夏之芳為雍正元年恩科進士，雍正五年奉旨出任巡台御史，六年十一月并與赫碩色（與夏氏一同赴任的滿御史）奉旨再留任一年。夏氏為實際負責台灣學政工作的第一位御史，對台灣科舉教育的改革、學風的整飾，均有一定的影響與貢獻。同時，在兩年的任期中，夏氏與台灣地方治安的維護、文武官員的糾舉、澎湖軍米的存貯等均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本文旨在記述夏之芳於巡台御史任內的事蹟，並藉本文的探討，嘗試以一位巡台御史的事蹟，作為巡台御史功能分析的開始。

唐羽 蓮溪葉氏之渡台與其祭祀公業之研究

本文探討對象，為台北盆地中，位處內港二大溪南支，今淡水河下游左岸，舊興直堡屬溪尾庄葉氏宗族的遷台、繁衍及其發展情形。希藉本文的宗族活動個案討論，探究傳統中國社會大家庭在台灣墾拓的過程，尤其清代中葉以後，此間宗族發展的情況。全文分三大部份，首先為蓮溪葉氏祖系的再澄清；次及葉氏遷台繁衍情形；再就契券、祭祀資料，探討葉氏在台的宗族活動及祭祀公業的建立、消長情况等。

建隘開墾，是台灣中北部墾闢青山荒埔的主要方法。隘設墾隨，隘因而成為漢人開拓土地的先鋒。隨著漢移民的大量湧入，人口遽增，生齒日繁，而愈墾愈近內山，因此產生「移隘」的現象。大體上，近山地區，較早開墾之地，由於墾殖活動逐漸深入內山，歷經移隘之後，外庄已不須設隘，而有逐漸向大墾隘集中的趨勢。道光年間所設「金廣福」總墾戶，即其典型之例。至於竹南地區，開發較晚，亦有朝大墾隘發展的情形（如廣泰成墾號），並且其組成方式、組織型態及墾隘規模，皆與竹北地區的發展，息息相關。

本文所欲探討之「獅潭山區」的開發過程，基本上屬於移隘後，朝向大墾隘集中之另一典型，設隘開墾時間與地理位置，正好介於金廣福及廣泰成兩大墾隘間。主要墾首黃南球與劉緝光，和金廣福墾首姜紹基，均成為廣泰成的創始股東之一。足見獅潭山區的開墾，與竹北、竹南兩大墾隘，具密切關係。而獅潭山區的拓墾規模，遠不及金廣福及廣泰成，亦無二者合併舊墾隘、總墾經營的有利條件，然則移隘後，獅潭山區所涵蓋的外庄墾隘，卻高達十四處之多，範圍之大，可為探討內山拓墾史的特殊範例。

洪麗完 清代台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

本文宗旨，主要討論清代台中地方（指大安溪以南，大肚溪以北地區）福客間的關係，並針對日據時期所作為漢人移民籍貫調查資料「閩海、粵山」的分佈狀況，暨形成此一分佈特徵的因素，即「閩人先至，佔據沿岸肥沃地區，粵人後來，故只能聚居山區貧瘠之地」，提出質疑。作者除利用現存文獻記錄，並輔以訪談調查所得資料，作為分析基礎。

就清代台中地方的開墾而言，各地開墾活動的先後展開，端視自然與人文條件而定。閩粵移民入墾本區，人數或容有多寡之分，入墾時間則無先後之別，因而墾拓之區並無明顯「泉海、粵山」之分。所謂「泉海、漳中、粵山」的移民祖籍分佈狀況，乃清代中葉以來兩籍人民長期互動及同化的結果。換言之，二十世紀日治時期的漢移民祖籍分佈調查資料，乃至今日所見粵籍人士多聚居豐原市以東、大甲溪流東勢一帶的現象，並非自始已然，乃社會整合結果。

由於台中盆地以西，閩區粵人多已遠離原居聚落，少數則為閩人所同化，移墾早期的客籍聚落，已渺不可知。惟台灣特殊的移墾環境，造成特有的宗教信仰，尤其粵東客籍人士三山國王鄉土神的信仰，多隨其足跡，散佈台灣各地，三山國王廟亦多在客庄，故三山國王信仰足為客籍聚落之一標示。本文為具體說明福客間，因社經變遷，彼此間關係隨而產生變化，以至居於少數人的客籍人士，多遷而避之（或未遷而福佬化），進而影響漢移民祖籍分佈的再調整，特別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的興衰為例，解析其間變

遷。無論沙轆保安宮因福佬化傾向，而益見發展；或牛罵頭三山國王廟因保持原主神三山國王的祭祀，以致反不如保安宮的發展，其實質意義在於反映三山國王廟的興衰與福客人群關係的變化，息息相關。

陳美妃 台灣白話文學之文字理論與實踐(1924-1937)

就文學本位而言，始於一九二四，止於一九三七年的台灣白話文學本身，白話夾雜口語的文句風格，與亦文亦言的文句結構，既成就了時代風格，亦是一九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遠祖。對此項表達方式的致成原因與傳承脈絡的探討，為本文所欲嘗試解決之一問題。又台灣新文學產生時間既早，投入心力亦多，何以其成果，難以與日文作品相媲美？除了一九三七年全面廢止漢文的政治因素外，必有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原因，此本文所欲追索之一問題。質言之，本文擬就文句結構本質作一探討，希冀經由對日治時期白話文學文字結構理論的整理與釐清，以確認白話文學風格之致成因素，及白話文學難以蔚為景觀的緣由。

所得結論：台灣白話新作品中，亦言亦文的風格乃自然形成，而非理論引導。由於漢字屬形文字（依形表義），語言屬適耳性工具，不同於漢字之為適眼性工具，因而，在台灣選擇以「形義文字」拼音時，對智識貧乏的無產大眾而言，仍無法改變文盲的劣勢。換言之，由於漢字新字的根本限制，致文藝不僅無法救援文盲，達成啓發，反而增加識字階層的負荷和阻力。漢文字拼音化的本質缺失，是標音論顯而不彰的主因；標義論的隱而不絕，則是五四模式影響留華士人並間接影響台灣文壇的見證。而台灣白話文領域中，亦文亦言的風格，則是二者交互制衡的結果。台灣新文學之難以成為文壇主流，原因在於漢文字表達方式發展過程中，存在難以避免的各種滯因。

王振義 從歌仔調的歌唱特色談「樂合詩」與「詩合樂」的歌唱傳統

歌仔調是唸歌與歌仔戲常用的「詩牌」總稱。詩牌與「詞牌」或「曲牌」，同是「按樂填詞」用的牌調。所不同者，在於前者都有不同的唱調，歌詞結構卻清一色為七言四句詩體，而詞牌及曲牌中的牌調，則分別代表各不相同的文詞結構及不同的音樂唱調。故以詩牌為特性的歌仔調，歌詞並不註明唱調名稱，而由歌唱的人自由決定唱調。此一按樂填詞，以樂合詩的歌仔調歌唱方法，似即我國古代「按樂填詞」的歌唱方法。本文宗旨，主要藉歌仔調的歌唱特色，說明漢民族歌唱觀念及「樂合詩」、「詩合樂」的歌唱傳統暨其發展情況。全文分四部分，包括歌仔調的「樂合詩」歌唱特色；「樂合詩」的歌唱傳統；「詩合樂」的變異發展與困局；及漢語特色與詩樂關係。

陳炎正 大陸有關台灣史料之研究

近年來，中共對台灣歷史的研究，十分積極。不但成立專門研究台灣史的機構，積極從事相關資料的發掘與整理外，並投注人力於史料考訂與研究。目前中國大陸在清代台灣史的研究及史料的發掘應用方面，成果較多。本文作者，藉中國之行，走訪大陸有關台灣研究的機構，並檢視其研究情形。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分三部分介紹：其一，主要研究機構；其二，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其三，研究成果。

曹永和 有關日本長崎華商「泰益號」文書與台灣商界的關係

長崎華商泰益號是金門陳世望，於一八九〇年八月設於長崎市新地町二五番地，從事陸海產及各種雜貨進出口經營的商號。藏於日本長崎市立博物館的「泰益號」文書（包括簿冊類三三五一冊；書信三萬餘封，即泰益號創辦人陳世望後代所贈。自世望父陳國梁以來，及子金鐘祖孫三代均為長崎華商領袖，陳家所保存文書當為清末以來，近代日本華僑商界的寶貴資料。而陳氏三代在長崎營商的翔實紀錄（1861-1939），正處於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一連串的政治、社會、經濟的轉變時期，適足以提供當代日本華僑的處境及對應此一經濟活動盛衰轉變處理方式的個案具體事例。尤其泰益號貿易交往對象，主要是與華商交易，台灣商界又是其中最主要交易圈，故泰益號的紀錄和文件，不僅是日據時期台灣商業發展、分析研究的重要資料，從其書信的行號與地址，尤能作為台灣史研究的新史料發掘暨蒐集的重要線索。泰益號文書的重要，目前已受日本與台灣學界重視，並已進行相關研究計劃。本文除對泰益號歷史及其文書作簡介外，並對已有研究成果及正進行中的研究計劃，加以說明。

張炎憲 苗栗鯉魚潭巴宰族的古文書

古文書的利用，可以補助地方志暨其他文獻資料研究上的不足，尤其是整批相關古文書的出土，往往足以釐清渺茫不清的歷史事實。鯉魚潭潘氏所提供關於巴宰族五十三件古契約書的發掘，有助於解決巴宰族與鯉魚潭移墾發展之間關係，尤其五十三件的古文書中，大部分與*里蘭社（岸裡社分支）有關，足証蕨里蘭社與鯉魚潭拓墾，具密切關係。本文依據潘氏提供的古文書，指出今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與巴宰族發展、播遷，乃至平埔族漢化中的傳統文化保存狀況。（洪麗完）

台灣史研討會

台灣大學歷史系為慶祝台大創校六十周年，特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假文學院會議室舉辦「台灣史研討會」，會中共有八位學者提出報告，茲簡介如下：

宋文薰 卑南遺址的發掘

一九八〇年夏季，台灣東線鐵路與南迴鐵路的工程，大面積的暴露出卑南遺址豐富的文化遺物與住屋、墓葬等遺留，石棺內的精美陪葬品且引起嚴重的盜墓行爲，造成社會大眾廣泛的注意，致使有關單位特別委請作者與連照美教授，率領台灣大學考古隊進行搶救式的考古發掘。卑南遺址係台灣東海岸地區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系統的代表遺址，其發掘工作迄今年八月，已經歷十三次而暫告段落。九年來所收獲的古文化遺留，顯示這一系統文化與中國南海、東海地域的史前文化均有關聯，台灣東部史前考古學的重要性亦因此發掘而大爲提高。目前，教育部正在當地規劃一所國立的考古學博物館，其名稱暫定爲「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此外，台大考古隊亦已出版或完成多篇發掘報告及研究論文。本文即爲作者多年來從事卑南考古發掘工作的簡要報告。

費永和 簡介維也納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台灣古地圖

Laurens van der Hem-Atlas是世界上罕有的十七世紀荷蘭古地圖集，不但品質精緻、製作豪華、數量龐大，更主要特色在保存了許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祕密地圖。

東印度公司爲壟斷通商貿易之利，保護特權，在亞洲各地區、各港埠所測繪的地圖、海圖，均視爲高度機密，深藏於檔案裡面管理。由於原圖甚少留存於世，本地圖集便格外重要；目前典藏於維也納的國立圖書館中。

一九七八年，作者於海牙偶然購得 Vrij, Marlike de: *The World on Paper;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artographical Material Published in Amsterdam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msterdam, 1967)，係第三屆地圖學國際會議古地圖展覽會的解題目錄，始獲知該地圖集收有與台灣相關的古地圖。本文即作者綜合各項資料，介紹十幅從微卷放大的台灣古地圖，逐一說明、譯介，並作簡單考訂的論文。

黃富三 從林文明「正法」案看清代台灣的司法運作

林文明爲霧峰林家林文察之弟，曾於同治初年參加太平天國與戴潮春事變的平定工作，兩兄弟因功而打入當代的官僚階層，文察高居福建陸路提督之職，文明也榮登副將，堪稱既富且貴；但未久，林文明卻於同治九（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七日，以「謀叛」嫌疑被正法在彰化縣公堂之上。作者針對本案，蒐集相當豐富的訟案文書、有關文獻，作爲探索命案真相的資料基礎，描繪其大致的形成背景、事件過程，以澄清官方說法的

謬誤、民間傳聞的朦朧，並以之檢討清代台灣司法審判程序與實際運作的問題。文內指出：各種證據均顯示，處死林文明是地方官府精心策劃的預謀，儘管林家四次京控、案延十餘年，但在清廷行政、司法不分的制度缺失前，地方官上下其手，冤獄往往相應重重弊端而滋生，該案的真象便僅能訴諸歷史判斷，始有大白的機會了。

陳志梧 清代噶瑪蘭城的空間復原

作者利用現存的文獻記錄、日據時代測量地圖及實際田野勘察訪問等資料，比對研究，提出與藍厚理(Harry Lamely 1977:165)不同的復原，以重建清代噶瑪蘭城的空間配置。作者同時進一步討論噶瑪蘭城的空間形式與城市功能間的關係：當時噶瑪蘭城除了繼承其在農民社會中生產和交換的角色外，也發揮了執行國家統治的功能，藉著古老中國空間意識形態中的「形相」與「生氣」，賦予清帝國一個「君權神授」的具體形象。換句話說，清代噶瑪蘭城的空間形式，在當時政治及文化層面上的意義，是一個用空間神話將統治神話具體化的作為。

張文憲 日治時代台灣社會運動——分期和路線的探討

作者藉助基本史料：警察沿革誌，和近人專著：許世楷、葉榮鐘、連溫卿、若林正文、史明、淺田喬二、向山寬夫等的論點，將日治時代台灣社會運動的關連、分期和路線問題作一綜合的回顧與陳述，再進而提出其對台灣社會運動無法突破困境，反而日趨消失的看法。

本文指出：台灣在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尚未凝聚整體的社會力量，也未建立起自主的行政體系，直到台胞在日本人的權威統治下，經由新式教育和世界思潮的影響，才漸漸產生以台灣全島為主的意識，並以之對抗日本。然而，無論運動的進行方式，採行的是左派或右派的思想、路線，雙方都不能失去彼此的協助、支持和資源，否則便很難克服發展的瓶頸；此即當時台灣社會力量未能統合，所導致整個社會運動難以開花結果的原因。

顏娟英 台灣早期西洋美術的發展

台灣早期現代美術的發展，與新式教育的推廣（台北師範學校）、日籍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等）、台灣總督府（官辦公開競賽的展覽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換言之，台灣早期西洋美術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特色類似，也是靠著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推動而蓬勃。

一般討論的意見，多以一九二七年的台灣美術展覽會作為此發展的標竿，作者則認

為：一九二〇年，台灣留學生黃土水入選帝展始為劃時代的指標。重要的日籍美術老師來台，更多的留學生赴日學習美術，都發生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作者又指出一九三二年，可視之為日據時代美術史的另一個劃時代指標。這一年，廖繼春、陳進被選為台展的評審員，是為展覽制度對台人所容許的最高榮譽，對台人有極大的鼓舞作用；再加上受過新式教育訓練的林錦鴻返台擔任記者，在「台灣新民報」上作美術報導與評論，台灣的美術活動始更明顯的進入新的領域。

黃俊傑 戰後台灣農民社會意識的變遷

本文以文獻資料為基礎，分析光復以來台灣農民社會意識的變化：五〇年代台灣農民的社會意識有兩個面向，一是地主與佃農關係的緊張化，一是隨土地改革成功，農民對農會出現認同感；嗣後，台灣農業部門的危機日益加深，農民的共同經營意識相當高漲，而且呈現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對農會的向心力亦日趨瓦解，是為七〇年代以後台灣農民社會意識的面向。

作者思考的問題是：此種變遷，蘊涵的歷史意義為何？在回溯一八九五年以來的台灣歷史後，本文指出日據時代以降，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即呈現資本主義化的趨勢，而使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全面改變；「國家」力量、「政府」部門對台灣農村的滲透，從日據時期便已深入，至戰後更為直接。兩個歷史脈絡的糾結，使台灣農村發展出獨特的性格，其農民社會意識的變遷，始能獲得較具歷史涵義的解釋。

吳密察 台北帝國大學在日本殖民地教育體系中的意義——從殖民地教育學制的角度看台北帝大的設立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試問：日本殖民者為何會有這種違背殖民統治技術——一般均偏重於生業技術的實業教育，或僅普及熟習殖民者語言、文字的初級教育——的措施呢？

作者利用日本中央政府在制定殖民地教育相關法令過程中所留下來的檔案資料（以內閣檔案的「公文類聚」、「樞密院文書」最為重要），作為分析的依據，並呈顯殖民者在整個決策過程中所表現的各種意圖、擔心和考慮。面對台灣民衆澎湃的教育要求，殖民者不能不講求因應之道：與其讓殖民地的青年赴內地留學，不如在殖民地設立較高級的學校來收容有意升學的殖民地青年；與其允許殖民地人民設立私立大學，不如搶先在殖民地設立大學，以免造成統治的困擾。此即台北帝國大學所以成立，其作為殖民教育體制一環的緣由。（詹素娟）

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雖然基督教（指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僅占台灣總人口數大約百分之五左右。但最近幾年來，該教（特別是長老會與新約教會）對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所起的作用，卻不容輕視。不惟如此，回顧台灣的歷史，基督教對台灣歷史社會的形成，也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角色。若更進一步，從基督教在華人社會之本色化（Indigenization）、或實況場合化（Contextualization）——這是基督教本身的宣教學或神學之課題——的過程來看，台灣基督教的歷史與現實，也都是有識之士所熱切關懷與研究的議題。

由基督新教創辦的中原、東海與東吳大學，以及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中心所聯合召開的「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十七日）」，就是上述議題的一項研討工作。這次的研討會共宣讀十八篇論文，而誠如主辦單位之背景與會議主題所顯示的，論文絕大多數是以中國（大陸）為關懷對象。不過，仍然有三篇論文是以台灣為議題，頗值得在這裡略為介紹。

Baruch/Cuny 歷史系的 Murray R. Rubinstein 之論文「新約教會與台灣的基督新教團體」，除了交待新約教會的起源與目前的活動外，還進一步分析該派的哲學與神學基礎、該會與台灣主流教會之間的互動，甚至還觸及當前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教關係問題。

自一九一、二〇年代，基督教界在華人國度中提倡基督教應中國本色化之後，至六、七〇年代，又有更進一步主張除文化本色外，基督教應落實於當地的社會、政治脈絡中，亦即基督教的本土化、實況或場合化。台灣的革新基督教界自七〇年代以來受此「兩化」之影響，應可謂不小。而其發展實況又是如何？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瞿海源的「台灣基督教會本色化與場合化一些觀察」論文中，即就主張本色或場合的各教派進行考察。他除了指出雙方之神學上的窘境，以及宣教策略的轉變外，同時還指出主張基督教中國本色化的教派，迄今對台灣社會的關懷方面，仍然表示了冷漠的態度。

中華福音神學院助教授史文森（Allen Swanson）的「台灣本土的福音關聯化（Contextualization in Taiwanese Context）」論文，也是就兩化問題進行典範（Paradigms）的方法論初步探討。他指出各方的教派對台灣的各階層有其獨特的吸引力，而且還指出，雖然自稱本土化的長老會，在某些方面還是難予擺脫西方基督教之模式，但相對的，真耶穌教會卻反而更能表現出不受西方的影響。

也許這三篇論文會讓人感覺到只是在討論基督教的神學或宣教議題，不過，如果我們瞭解到基督教在台灣歷史，乃至現在所扮演的角色，那麼，類似這方面的研究題目，對研究台灣歷史、社會的學者來說，依然是必須注目的範疇。（翁佳音）